

怀念徐森玉尊长

夏玉琛

徐鸿宝，字森玉，浙江湖州菱湖人。自抗日战争以来，笔者尚年幼时，就长期追随森老。那时与徐老始相熟。

兹略述往事一二，以志缅怀。

1940年前后，森老赁屋于茂名南路南昌路口的一条弄堂房子的二楼，隔壁为著名书画收藏家钱镜塘先生的寓所。森老其时奔波于广西桂林、香港、上海之间，在故宫博物院任古物馆馆长之职，又为北京图书馆数十箱善本书的藏储在沪煞费苦心。与其共事者有李芳馨、饶馥伯（已故）、王育伊（已故）诸老。郑振铎（郑西谛）先生与森老素相莫逆，亦时有走动，互通声气。

森老生活很朴素，早晨自己泡水。爱读瀛奎隼随，朱笔校阅。偶亦作书法，写字对。翰墨精彩，集神专注，游欧阳询，笔画劲雄圆，别具一格。在复兴中路复兴坊1号也住宿过一段时间。

其弟徐鹿君先生在上海中南银行任职，家住延安中路升平街。女婿王辛笛先生在上海金城银行任职，儿子徐文炯在上海浙江兴业银行任职。这些亲属时常出钱出力帮助森老为公家办事。森老在上海有一个知友，名曰沈仲章，北大肄业生，抗战期间沈君从事木材等商业，寓居于八仙桥青年会。沈君对森老在经济上也常有资助。

此外，森老与汉口路一带的古书店如来青阁等处，亦时有走动。森老在抗日战争时为北图储存在上海的数十箱宋元版善本书几次搬迁，在1945年春，又运了一部分放在长乐路友华新村31号，在日本投降后，方由北图驻上海办事处（宝庆路17号）运回，并安然运返北京图书馆。听说是账物相符，少有缺漏差错。

森老于解放后，在上海文物、图书、博物学界颇著声誉。身兼数职，第二曾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特邀为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副馆长等职。著名学者王重民、赵万里二人

的版本、目录学，曾受森老启迪。森老与顾廷龙先生也时有酬应。

徐森老谢世二十年，思之不已。

1990.3.27

其骨灰匣安葬在苏州西跨塘七子山麓，由李一氓题写墓碑，为森老的身后增辉。往事历历，但愿政通人和，祖国昌盛。



第 453 期

2021年系上海博物馆馆长徐森玉先生诞辰140年暨去世50年，亦是其学术助手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先生90岁诞辰。近日，上海博物馆将举办“怀玉守正”学术座谈会，缅怀两位前辈对上海文博事业的卓越贡献。

《文汇报学人》特此发表徐森老继子夏玉琛先生的未刊稿《怀念徐森玉尊长》与其子夏兆成先生的回忆录，介绍徐森玉湖州故居近况，并追思汪庆正先生的图书文献整理事业，以作纪念。

——编者

纪念



大克鼎
西周孝王（公元前10世纪末）
光緒中期陝西省扶風縣法門鎮村出土

大克鼎与大孟鼎为有铭文青铜鼎中最大的两件，至为尊贵，系潘祖荫冯喜斋旧藏。1951年，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的徐森玉主持潘氏后人将二鼎的捐献。大克鼎成为上博引以为豪的镇馆之宝，大孟鼎现藏中国国家博物馆。

论衡

「技术流」的权威之外

编译/本报记者 李纯一

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和阿德里安·维尔米勒（Adrian Vermeule）可能是当今美国高等教育界最诡异的一对学术搭档了。两人背后的传统大相径庭，但十多年来，却共同撰写了大量法律分析著作。近日，这对“怪偶”合作的新著《法律与利维坦：救赎行政国》（*Law and Leviathan: Redeeming the Administrative State*）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所谓“行政国”主要指美国联邦政府的独立规制机构，起源于19世纪末。这类机构由国会立法建立，负责某个具体的公共政策领域的规则制定和实施，理论上不受总统控制。美联储、联邦贸易委员会、核监管委员会、美国环境保护署都属于这样的机构，可以说立法、行政和司法权力于一身，被称为“第四政府部门”。也因此，其法律地位一直受到质疑。特朗普任内的国内政策即被研究者概括为“解构行政国”。

桑斯坦和维尔米勒援引著名法律哲学家朗·富勒，强调法律具有内在的道德性，遵守规则、保持透明可以以美国极度膨胀而冲突频现的这个“第四政府部门”正名。桑斯坦曾与行为经济学家理查德·塞勒（Richard H. Thaler）合著《助推》（*Nudge*）一书。塞勒在201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们在书中提出，普通人经常受到非理性偏见的影响，因此一个理性和道德的国家需要一个由社会科学家或“选择设计者”组成的专家阶层，通过行政机构助推民众做出更理性的行为。此类架构类似于为民众在信息纷繁的生活世界里提供一个GPS，它标出山川沟壑，推荐最优路径，但选择权在个人。书中主要关注福利领域，如退休储蓄、医疗保健和教育。维尔米勒总体上认同这个方案，只是他希望借由这些社科精英主导的行政规则来服务于美国社会的重新基督教化。

佩珀因因大学政治学者杰森·布莱克利（Jason Blakely）在《高等教育纪事报》上评论说，桑斯坦和维尔米勒的论证看似中立，实际上只是一种减弱的康德式义务论，且具有高度的倾向性——他们希望围绕权威、知识、理性和权力等非常具体的概念来组织社会；他们认为，那些在人文社科领域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是在道德上负责任的行动者。然而，布莱克利指出，众所周知，专家对人类行为的预测往往不大灵验。菲利普·泰特洛克（Philip Tetlock）的研究就发现，在预测自己专业领域的未来方面，社会科学家的甚至比不过其他领域的中等知识同僚——“一个课题辛辛苦苦搞几年，结果预测起来，和那些门外汉一样糟糕。”

布莱克利认为，正是技术专家精心策划了一门经济“科学”，造成了严重的不平等和2008年金融危机。此外，美国选举政治发展成一个赌博型的预测市场，建立在所谓专家知识上的灾难性的美国中东问题决策，这些专家们更是难辞其咎。他还指出，社科专家之所以能在主流社会理论中独领风骚，部分是人文社科保守的结果。大学内外一直有一种呼声，要求人文主义者证明文科教育的“价值”，结果资金便流向了那些被认为运用更科学、更切实的方法研究人类行为的学者。

近日，桑斯坦被拜登任命为国土安全部顾问，以确保新的移民政策有充分依据，且合乎法律。桑斯坦曾任奥巴马政府的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扮演行政立法者角色；与拜登三十多年前就有过交集。他是那个“高产令人难以置信的学者，声称精通一切”。2018年，桑斯坦获得诺贝尔奖，这项由挪威政府颁发的殊荣被视同人文社科领域的诺贝尔奖。桑斯坦的大女儿鲍尔（Samantha Power）则被拜登提名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他曾是奥巴马第二任期时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太太的财务信息中披露，桑斯坦平日所获咨询费颇丰，客户中包括苹果公司等，勤奋著书的他版税也相当可观。

在布莱克利看来，法律等传统人文社科中盛行“技术流”，是因为这些专家能够利用STEM学科的威力来增强自己的权威——将人类生活归结为一种科学，进而享有充足的研究资助和极高声誉，桑斯坦和维尔米勒便是这类权威的顶峰。布莱克利提供另一种声音，他说这些权威的“魔力”不能轻易取代人文主义者的文化和历史解释模式，以及人文主义者对普通人的知识和行为的尊重。这些知识权威并不一定在道德和理性上更优越，相反，可能正是他们阻碍了人们思考美国当前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真正重大问题。

作为上博的一个部门，敏求图书馆“埋头故纸堆”，做了这些应做之事；我想，也只有孜孜矻矻，才能告慰汪老师，不辜负前辈们的期望，当得起上博的声誉。

（作者为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员）

记徐森老与家父

夏兆成

令我难以忘怀。所以，眼下我的微信名字依然沿用着这一小名，也正是为了铭记祖父森老的恩典。家父曾告诉我，森老甚至还曾替我起过一个大名叫“霜映”，寓意生命只有经历过严寒霜冻，才能绽放出丰硕的成果。此番纪念森公公诞辰140年的盛典，委实令我感慨良多，感恩不已。

再说家父在森老栽培下，自上世纪50年代起接触古书画，因编目需要，常会从文献检索书画家生平资料来提高自己对古书画的认识，并对感兴趣的题材自觉过录研究揣摩，终于40岁时在国家级杂志《文物》月刊发表第一篇古书画学术论文《记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合卷》，考证评述苏东坡、文与可的绘画特色，从此奠定了他在古书画研究上

的一席之地。

退休前几年，家父还手不释卷，甚至看起了卷帙浩繁的《二十五史》。原来他是受文管会副主任方行先生委托在整理《王文公文集》。此书系由废弃公文纸张印成，纸背是宋人官场往来书信，方先生非常看重，多方听取家父意见，提纲挈领定好格局，因了解家父学识而专门委以重任。家父遭难历时五年，终于在退休后出色完成这一整理研究任务，将之定名为《宋人佚简》，并特意作序，因为它凝聚了家父暮年的研究心血。如今检视他遗留的工作笔记与各类书画评析文稿，毫不夸张地说，足可用麻袋来装运。这是他留给我的不朽精神财富，我将永远好好珍惜。

顺便一提的是，这部书当年也是徐

原本以为，徐氏祖居就是两层楼的水泥建筑，实际上并不如此，在寻访中发现，徐氏祖居是一个庞大的建筑群落，故其中的一条弄堂以徐家弄命名。从菱湖丝厂的老厂门出去就是徐家弄，徐家弄两侧的房子都是晚清建筑，基本保持原样。在徐家花园西侧有一两层楼老建筑，是走马楼结构的晚清四合院，雕梁画栋，有一偌大的天井，曾经作为丝厂的招待所，面积在三百平方米左右，这里也是徐氏祖居。从徐家弄左转大概五十米，有一座三进深的晚清建筑，铭牌是“五桂厅2号”，这里也是徐氏祖居，目前是湖州水文保点，说明牌上写着：湖州市历史建筑，五桂厅徐宅，地址：南浔区菱湖镇北栅社区五桂厅2号，宅第民居类建筑，始建于清末。建筑坐北朝南，为二层砖木结构，分列两条轴线，均为三开间三进深建筑，屋顶为硬山造，用阴阳瓦，正厅两山用马头墙，用材考究。

五桂厅徐宅边上是朱宅，附近有沈大兴弄和杨家弄，离这儿不远的北桥浜路有现代抗日英烈、驻马尼拉总领事杨光远的故居，杨光远和严幼韵生有三位女儿：杨蕾玉、杨雪兰、杨茜恩，而以杨雪兰最为著名，也是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也是许多中国艺术家走向世界的推手。距徐家弄不远的人民北路241号，是著名学者任鸿隽的故居，任鸿隽倡导“科学救国”，发起成立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科学画报》等刊物，1958年，任上海图书馆馆长。

菱湖丝厂厂址现在是国家工业遗产，包括徐家花园在内，形成了丝绸产业完整产业链的工业遗址，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有关部门在调研后建议申报世界工业遗产。

目前徐家花园还保留有假山、亭子，以及大片的树林，有芭蕉树、枣树、香樟树、石榴树、银杏树、紫藤等，其中在东侧有一棵一百二十五年以上的参天银杏树，还有一棵一百五十年的紫藤树，这些都是当年花园的旧物，树林空旷幽深，依稀能见当年的盛景。

赞助费最后由香港著名收藏家社团——敏求精舍提供（故建成后对外亦称“敏求精舍图书馆”，即是汪老师联络的结果。

建立馆内的图书馆，首先要有特藏，即有一批属于自己特色的“镇馆之宝”。敏求精舍之所以应该建立、也能够建立起来，就是因为历史形成的特殊收藏条件——不是有了招牌去建个馆，而是有了藏品、有了顶层定位之后，去盘活、利用而成信。上海博物馆曾经聚集大批文物、历史等相关学科的专家，曾经接受许多藏家的捐赠和其他机构的移交，上海博物馆还曾经是上海市文物保管（管理）委员会的所在机构，承担社会文物（流散文物）的管理职责和出口文物的检查职责（海关文物检查站），因此有大量图书文献得以聚集，其中包括青铜、古陶瓷、字画、工艺品、考古、古文字、历史、古典文学等相关的内容。这些专业图书文献的原收藏者，名家及其后人居多，主要有徐森玉、吴湖帆、冒广生、李荫祁、钱镜塘、徐懋斋、龚心钧、丁福保、叶恭绰、郑家相、孙伯渊、孙鼎、戚叔玉、秦康祥、罗伯昭、康保庄、朱孔阳等，他们原是为治学、收藏研究而藏书，因而在捐赠文物时顺便也捐赠了相应文献。馆藏从古代青铜器名著《宣和博古图》刊本，一直到现代青铜器名家著作；从古代陶瓷名著《景德镇陶录》，一直到现在陈万里等撰写的专著，还有吴湖帆的书画鉴定笔记、邓之诚流传一时的名作《骨董琐记》稿本，地方文献可以豫园主人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原稿为代表，钱币拓本可以罗伯昭《沐园四十年拓》为代表，印谱钞印本中更有大批精良制作。这些都是既体现特色又服务于上博各学科的宝藏。

有了收藏还须有合理管理和专业团队。汪老师特地地安排了图书馆，

在湖州菱湖寻访徐森玉故居

徐勇

回忆汪师，不由想起初见他的情形，那是在一个满是阳光的冬日午后，复旦某阶梯教室座无虚席的文博讲座上。先生戴一呢帽，系着围巾，指间夹一支粉笔，滔滔不绝讲了两个多小时。他讲陶瓷史，从陶瓷的烧制工艺讲到各大名窑的特点，那口“苏式普通话”，那神采飞扬的神情，形象生动的比喻和随手拈来的引证，令大家如听书般着迷。文博系列讲座多由上海博物馆专家担纲，组织讲课的朱维铮老师怕内容艰深、学生坐不住，曾预先打招呼：“博物馆的专家不是吃开口饭的，遇到枯燥乏味的地方怎么办呢？——听下去就是了。”可是，我们听汪老师的讲座，非但用不着“听下去就是了”的决心，而是欲罢不能，如痴如醉。

后来，我很幸运地按分配去鹿鹿路上的市文化局报到，再具体“落地”到中汇大厦里的上海博物馆，从事图书文献整理。在上海博物馆新领导班子组成后，汪庆正先生和马承源先生及其他领导一起，改组部门，听取意见，规划未来。其中，业务部门的重新划分对今后工作影响很大。原来的陈列研究部，集中了青铜、陶瓷、书画、工艺等许多专业人员，现改设青铜器研究部、陶瓷研究部等各部。形成按学科分类的研究、管理体制。对图书文献这一块，汪馆长亲自兼管，明确提出要深入钻研基本目录之学，重视碑帖整理。他查看善本、拓本，边看边讲；看到董其昌、改琦的稿本，连声说“阿拉真的有弗少好故事”，勉励我们予以查考，还特别好介绍了陶湘《涉园丛书》的价值，嘱咐一定保护好并加以利用。对于古籍版本，他要求年轻人将《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烂熟于胸，对四库未收、丛书未见之书，又须熟知怎样查；对于碑帖中的草书，他要我们克服畏难心理，并介绍说：“拿一部《阁帖》，对照释文多看几遍。”

到湖州菱湖寻访文博大家徐森玉的故居，没有多费周折。在朋友引导下，我们找到了菱湖丝厂的陈美丽厂长。徐森玉家族的徐家花园就在菱湖丝厂的厂区内，徐家花园很大，以前从花园南门出去，就是运河，菱湖最有名的安澜桥横跨其上。工人进出的厂门也是南门，不是现在的西门。现在的徐家花园已经杂草丛生，她拨开齐人高的杂草，走到一堵围墙旁，告诉我们这是厂区现在的围墙，隔着墙外的弄堂是一排老房子，以前花园里还有一棵四五人合抱的银杏树，据了解，这棵银杏树在上世纪50年代末被砍掉，树根被用来炼钢了。

好古敏求

——汪庆正师与上海博物馆图书文献整理

顾音海

为加强业务学习，还安排由部门内的文献专家沈宗威老先生定期开设讲座，专讲古籍版本目录，又由沈先生主持翻检古籍，将善本标准者升格为善本，同时给我们讲解版本特征。从此，图书资料被正式纳入馆内文献学学科建设的范围，整理研究的头绪也就清晰起来。

整个业务的气氛也渐渐浓厚。室内老同志曾经说，“沈（之翰）馆长对我们的要求是‘拿得出’，要做到很难”；图书资料室前主任丁义忠先生被指定负责新成立的文化交流办公室，他也说过，“老早我们做点业务就被人家说不务正业”——所说的“业务”主要是指室内主持整理出版的《上海碑刻资料选辑》和康有为手稿。记得当时主管文管会和博物馆的方行副局长，还曾经在我们根据馆藏整理的《康有为遗稿》出版、署名时，特地起了“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文献研究部”一名，写在作者栏内。

上海博物馆在人民广场新馆建成前的十年间（1985—1995，同人称作“马、汪时期”），对内狠抓业务，对外诚交朋友，广结善缘，经历了许多重要事情，促使全馆有了空前发展。最终，另建新馆的要求呼之欲出，顺理成章。现在说来一气呵成，当时则是“无一日无事情”（汪馆长长语）。

籍企业家章荣初创办菱湖丝厂。这座两层楼的水泥建筑，是利用老屋的木柱子

和梁架，敷上水泥而成的一座现代中式建筑，后因白蚁蛀梁拆除。徐森玉曾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等职，1949年后，曾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上海博物馆首任馆长、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馆长等，实际上是上海文物的掌门人。由于他在文物考古方面的巨大贡献，周恩来多次称他为“国宝”，世界考古学界于2001年追授他“世界十大文物考古学家”的殊荣。

清光绪七年（1881）7月23日，徐森玉出生于湖州菱湖镇，八岁丧父。有兄弟三人，兄守之，名鸿斌，弟雁江，名鸿宾，徐森玉本名鸿宝，字森玉，后以字行。其母出自湖州织里晟舍的版刻世家闵氏，亦能刻版印书。徐氏三兄弟的父亲以典当兴家，三兄弟后来分居三地，徐森玉定居上海，小弟弟远赴香港，只有老大徐鸿斌一支回到故乡菱湖。